

推进户籍改革 需要更多有效措施

今年上半年,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的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完成了对浙江、广东、江西和贵州等8个有代表性省份的调研。调研课题涉及农民工融入城市化的成本、城市综合交通网络建设、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其中,在调研户籍制度时,调研组发现“户改几乎遭到所有市长的反对”。

在国家层面,从不缺乏类似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话语。从2001年户改文件下发,到2011年国务院出台《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都提出地级以上市区全部放开户籍制度。那么,为什么这一改革几乎遭到所有市长的反对呢?原因在于,户籍制度并不仅仅是一种身份间隔,还直接教育与、社保、医疗等多种福利挂钩,地方政府如果要放开户籍,势必也要扩大城镇福利覆盖的范围,但地方政府目前多数都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尤其在房市调控严峻、土地财政收入缩水的情况下,地方上更是压力巨大,因此,遭遇市长的反对也是难免的。

但市长的反对仅仅是表象,如果我们追问就会看到,户籍制度关乎地方财政,财政收入又关乎土地财政,土地财政又与现行征地制度有关,现行征地制度又与整个城镇化制度有关,这与户籍制度有关的教育、社保、医疗等更细的领域,更是与各种社会制度千丝万缕。这是从制度演化的角度看。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在改革发展中作为强势方的城市“理性”选择必然的结果:城市需要建设,需要足够多的廉价劳动力,因此,它需要市场化的劳动力的流动。像任何一个经济主体一样,如果这一目标可以在成本很低的条件下得以实现,它就将毫不犹豫地压低成本,将劳动力的流动控制在一定的幅度内。因此,将农民工身份模糊化,既能得到足够的廉价劳动力,又不需要为此支付势将减损城市利益群体的福利。由于进城打工者是自愿的,而且还能得到除农业收入之外的额外收益,因此,有人甚至将这样的经济过程称作“帕累托改进”。

这就是市长们反对的深层原因,这也是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推进艰难的原因。我们不能苛责地方政府的首长,因为这是他们在“其位”不得不做的选择。我们需要的是更宏观的政策层面的顶层设计。户籍制度改革不是要让市长们为难,而是要通过各种配套改革,包括征地制度改革、医疗教育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改革,让市长们有条件、有意愿去推进改革。实际上,即使纯粹从经济

发展的角度来看,户籍制度改革也迫在眉睫。所谓的“帕累托改进”时代早就过去了,城市用户籍藩篱将农民工们阻挡在城市外,但同时也失去了他们的消费,内需失去了很大的一块。同时,城市管理者们发现,他们在享受农民工为他们服务的红利时,也承受着社会治安问题频发的风险。这就是现代社会的倒逼机制,城市不能永远享受农民工群体的服务和劳动力红利却不愿意为他们付出,因为他们将为此付出代价。从长远来说,总有一天,所有的市长们都愿意并积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这才是城市发展的长远之道。

在过去几年,户籍制度改革总体上有进步,包括上海、深圳、广州等全国数十个城市都已经出台户籍改革的措施。在这些城市,居住证正在逐步取代暂住证,持证者将可享受与当地居民相同的社保、医疗服务、教育等公共服务。在一些城市中,农民工也正陆续被城市所接纳,他们迎来了迟到的尊严。同时,国家正在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转移接续体系,实现社会保障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建立个人终身社会保障号,并尽快实现全国联网,这些都为现行户籍制度改革加速奠定了基础。推动户籍制度改革,需要更多这样的措施。 南文

白领没钱消费 内需困境的一面镜子

如今,CPI增幅已经回落到2时代,负利率不再,而且今年上半年的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也跑赢了GDP增幅。按理说白领们的荷包不再羞涩,他们应该成为城市消费的主力。京城白领的消费尴尬,很自然地让人联想,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可能更加糟糕。在中国,高收入人群毕竟是少数,故而北京白领的消费尴尬其实映照出中国社会的内需困境。

投资不振,出口下滑,消费不举,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集体熄火,经济下行的压力可想而知。宏观经济学的规律和经济下行的趋势是吻合的。但在民生层面,通胀消弭却并未带来收入的实在增长,却是公众最为不解之处——通胀来袭,民生困苦;通胀离去,民生多艰。宏观经济下行,所形成的惯性压力,传导至基层民生带来的负面影响,还会不绝如缕地到来。而这一切,都会体现在居民收入的减少上,居民收入减少,内需更加萎缩。宏观经济与民生现实的连锁反应,将会形成一个恶质化的经济怪圈,深刻影响中国未来一段时期的国计与民生。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商品质量事故频发,一些中国商品丧失了市场公信力。以奶粉为例,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之后,国人对国产奶粉的市场信心一直没有恢复。网购洋奶粉,成为很多家庭的选择,即使是国内市场的洋奶粉品牌,也纷纷涨价。在此情形下,国产奶粉的市场境遇可想而知,由奶企更影响到奶农,多米诺骨牌一样地造成了整个产业链的失守。

还有,中国内需的最大困境是房市挤占了不多的国民财富。那些在房市泡沫中变成房奴的工薪阶层,将在10年~30年内忍受了工资全付月供的煎熬。房贷压力之下,哪有闲钱去消费其他商品?股市走熊,期望在股市赚钱的散户们也大多被吸金而看不到希望。

拉动内需,破解中国市场的内需困境,是个系统工程。提高工资收入,涵养中产阶级阶层,打造稳定型的金字塔社会结构,是提振内需的社会经济基础。促进产业升级转型,提高国货产品质量,是破解内需的市场诚信根基。优化财税体制改革,降低奢侈品出口税费,是引导外需转内需的必由之路。“铁公基”式的投资会带来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出口提振经济增长也要看他国脸色,只有内需是中国社会稳增长的安全动力。13亿人的消费力是宏大的,但如何让这宏大的内需潜力激发出来,是决策层亟须思考的命题。 张敬伟

当廉政底线又被围观……

据8月20日《法制日报》报道,“我承诺‘不偷懒、不贪钱、不贪色、不整人’……”这是湖南省祁东县人民政府县长雷高飞在一份方言速读书中的几句话。县长公开承诺“不贪钱、不贪色”的做法经网络披露后,立即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政府的公信力,无疑是由官员点点滴滴“言行”来构建的,因此,官员言行是否一致,就成了政府公信力的基石。官员在网上晒廉政承诺书,缘何会在互联网上遭遇“热脸贴冷屁股”的尴尬局面?那是因为民众热脸贴了太多的“双面官员”的教训。

去年,海口市国土局局长林明勇受賄落马,极具讽刺的是,这名官座,就是一面收钱一面大讲廉政。其在就任局长后,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要正确处理好人品与官品的关系、权力与责任的关系、自律与他律的关系。湖南省湘潭市原副市长朱少中,更是一个“双面官员”的典型。朱的父亲去世,朱在灵堂前立牌写上“拒收礼金”,还在媒体发表题为《反腐倡廉,教育在先》的文章,大谈反腐倡廉经验等,可结果呢,因为受贿、滥用职权,数罪并罚被判有期徒刑十年。

可以想见,就是在见识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双面官员”的真实嘴脸后,官员的公信力,就这样被瓦解或者是“误伤”了。前不久,《中国青年报》报道说,近年来,“质疑”似乎成了许多人的习惯。一听说有年轻干部被提拔,立刻就怀疑是“官二代”。许多人感叹,当大家都习惯性怀疑时,“陌生人”社会原本就不多的信任,也被再次蚕食。

更何况,正如有网友指出的,“不贪钱、不贪色”等清廉行为,本来就是每个公务人员必须做到的,现在倒成了官员向民众公开承诺的内容。

于是,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香港——世界公认的最廉洁的地区之一。香港的反贪教育和严格的执行制度让官员由“不敢贪”、“不能贪”转变为“不想贪”。所以,在现实的语境下,官员“不贪”的廉政承诺很是苍白无力。 吴杭民

王刚的锤子砸向了谁



王刚主持的鉴宝节目《天下收藏》。如果现场专家鉴定持宝人的瓷器为假,王刚则挥锤砸碎。最近有场外专家爆料,称反复观看后认为“砸碎的‘赝品’不少是真品,并且不乏珍品”。

这里有一个问题,现场鉴宝类的节目往往只是几位专家眼观、手触,确定真伪。目前我国尚未建立文物鉴定资格管理制度。谁有文物的鉴定资格,以及谁来对这些文物鉴定进行监管,这些问题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来回答。理论上,一个真正的文物鉴定机构,需要有经验丰富的鉴定者,同时更需要不同类型的精密仪器。不过,最关键的还应该就是这个鉴定机构的独立。 陆贞琴 刁博

“跪行管理”折射资本文化暴力

20日,西安城北一建材家居批发市场陶瓷精品区内突然发生的一幕,让很多商户目瞪口呆:一家商户的四名员工,从百米开外的两个不同方向,跪行至陶瓷店门口。该商户负责人表示,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员工得到内心升华”。(8月21日《华商报》)

因为没有完成业绩任务,就让员工“跪行百米”,还美其名曰“升华内心”,这种管理行为让人感到一股资本的冷酷气息。当前,在利润第一的资本意志下,形形色色近乎荒诞的管理安排频频登台亮相,再比如某公司的“如厕培训”,300多名员工要接受这项培训,公司的管理人员不仅在厕所里示范大小便的动作标准,员工学完之后还要签名确认自愿参加这个培训项目。

员工上个厕所还需要培训,完不成任务要“跪行”,员工感受到了侮辱,但企业管理者却声称“跪行都是员工自愿的”。当真是荒谬到了极点——这是一种怎样的管理心态?我看,要求员工“摆正心态”之前,管理者有必要先看看自己的心态“正不正”。

明明是管理心态出现了偏差,却上升到了企业文化的高度。该企业主管表示:“通过跪行方式可以让员工在心灵上得到一种升华,从而在内心上获得更大的能量……”当记者问,为何在员工跪行过程中,公司一些员工在哭泣?又说,“那是他们感动得在哭。”明明是管理粗暴,却打着文化的外衣,究其根本,无非是试图把员工“塑造”成随意摆布、指哪打哪、放弃个体价值思维的劳动力工具。

显而易见,这是一种伪企业文化,或者说是一种资本文化暴力。管理的决策和制度,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管理者自身的利益所在——如何降低管理成本,如何方便管理,如何取得最大效益等等。纵观那些“如厕时间不超过8分钟”、“工作时间内只能上几次厕所”之类稀奇古怪的企业制度规定,虽有形式的不同,但“本质”都是一致的。当前,如此资本文化暴力越来越横行其道,泛滥成灾。与管理蛮横等资本硬暴力等相比,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

试图通过企业文化来凝聚人心,提升管理水平,这本是一件好事情。但企业文化在很多经济体内部却异化成了资本维护利益最大化的道具,实在令人忧心。说句实在话,要想消除资本文化暴力对于劳动者权利的“凌辱”,指望资本“大发善心”是不行的,还是需要政府职能部门有所作为,为普通劳动者撑起一把权利保护伞,别再让一些无良的资本肆无忌惮地折腾企业文化。 王艳

不要让“人均工资”撕裂社会情绪

不由想起几年前一个著名的网络段子:“张家有财一千万,十个邻居穷光蛋,平均下来算一算,个个都有上百万。”所以一点也不意外,类似西城区“人均年薪超10万”等数据,又紧紧跟随着一片“拖后腿”“被平均”的哀叹。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又实在不知道,那些总是发出哀叹的群体,其基数到底有多大。显然在这方面,最擅长“数字说话”的统计部门,从未试图给出一个数据。

如果说统计部门长期容忍了“拖后腿”的群体面容模糊的现实,正好佐证了达莱尔·哈夫“精确度说明”缺失的论断,那么,这种缺失事实上早已不止于此。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种统计方法,即在职工平均工资统计时,对统计对象的单位结构作出相应调整,同时对不同行业、不同社会收入群体再作一些相关的分布性以及覆盖人数统计,那么,平均工资的统计数据或许会更真实。如果说,“平均数”是一个相当危

险的概念,已不只是因为它可能给决策带来的误导,也因为它一再地对社会心态产生刺激与挑衅。

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心态,指的是弥漫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中的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感受、社会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念的总和。“平均数”之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在弥散?我们看到的,每一次的“平均”数据,都带来一次羞辱与伤害。而那些总是“拖后腿”的群体,在日渐的面容模糊之中,日益被所谓的主流社会所疏离或者被抛弃,从而滋生进一步的心理失衡。由此产生的,是社会共识的破裂,社会价值观的分崩离析。

怎样的统计方法是科学的,如何让统计数据更真实全面地反映实际情况?这是统计部门要思考的问题。但一个面容模糊的巨大社会群体,总不可能一直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你终得正视他们。 杨耕身

新闻震撼的世界 作家何为?

周克华在重庆被击毙那天,作家邱华栋在新浪发了一条微博:“周克华被击毙了,可为什么这么仇恨社会?他这么干,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新闻结束的地方,是文学出发的地方。”

邱华栋的这几个问号,提出的正是“文学”的问题。换句话说,假如新闻是以“答案”的面貌出现,那么文学再次回到了“问题”。

在世界文学史上,有不少经典作品最初的灵感来自新闻报道。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来源于一则关于一个小镇上少妇的挥霍、出轨和自杀的简短新闻;马尔克斯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的重要线索也有一部分是依据一对美国老人私下幽会的新闻报道改编的。如果说,包法利夫人的原型在新闻里无非满足了读者对财富、性爱、自杀等狗血情节的兴致,福楼拜在小说中则是在追问关于欲望、享乐、背叛、忏悔等更多有关社会和人身自身的问题。这些内容不像新闻报道的故事一样容易解决,而是包含着无数的矛盾、不解、缺漏……文学的意义,恰恰在于它触及了深渊般的真实——那个创伤核心。

现实社会中,新闻关心的只是恶行的行为和事件,而文学关心的是恶行的心理、环境、成长……撇开忠实性不谈,新闻的主要形式是建构在一个简化的逻辑框架之上的,这个框架删除了所有的局部性芜杂。在新闻那里,一方面暴力和血腥可以使这个故事满足好奇心,另一方面任何暴力和血腥都必须纳入一套事先规划好的逻辑框架甚至观念框架内,不致让读者难以忍受,或太出乎意料,甚至一个完满的“结局”足以平息读者已经累积的不安。

但文学似乎是重新唤起了某种不安。相对于新闻的刻意简要,文学彰显故事的繁复与错裂。原初新闻中的单一情节在文学中必然引向更纠缠的人际网络,单一逻辑必然分裂成多重、互相交错的因素。这些都是文学更加关注的。这些形形色色的纷杂线索和层次比起表面的“事实”更具“真实”。也可以说,“真实”不是新闻所呈现的现象,而是现象之下无法被简单事实及其逻辑所容纳的无底深渊。而文学,作为问题的文学,正是在悬崖上,注视着那些悬浮或撒落在深渊里的生活碎片。

为什么邱华栋要对作家们发出呼吁?当前的时代,层出不穷的是对于震撼性事件的报道。但新闻报道往往浅尝辄止,甚或欲言又止。前几天在微博里看到有关哈根斯塑化人体标本展的消息时,我问了一个和邱华栋十分相似的问题:谁愿意来写这个题材吗?莫言?余华?还是阎连科?不断挖掘那个深渊般的真实,将震撼进行到底,或许是一个文学写作者唯一能够不辜负时代的方式。只不过像这样的作品总是在我们的大众阅读中缺席。 杨小滨

从“公选校长”的新试点,到选拔标准的新变化,再到校长头衔的“职业化”……中国高校干部体制改革正在稳步前行。细数近一年来教育主管部门和多所高校的新举措,不难发现,“公开化、专业化、职业化”已成为贯穿这一改革进程的最鲜明的标签。(8月21日《中国新闻网》)

“公选”的校长是什么级别?

长期以来,教育部直属高校校长通常由上级部门决定,今年教育部的“公选校长”试点,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由上级任命的惯例,成为大学校长人才选拔的重要方式之一。在笔者看来,作为一种教育探索本身其价值毋庸赘言,但也必须要承认和正视,“公选校长”距离高校职业化和高校去行政化其实还有遥远的一万米,要持谨慎的乐观态度。

我无意质疑“公选校长”的积极初衷和程序正义,也无法否认从上级任命的“惯例”到“公选”的确是一种突破,但在现实的语境下,无论是教育体制还是行政管理体制,都决定了“公选”的校长与任命的校长只是换了包装的“两朵玫瑰”,并无本质的区别——不信,请问“公选”的校长是什么级别?部级的还是部级,副部级的还是副部级,任职方式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大学校长官员化的“内涵”属性的改变——还不仅是大学校长,在大学内部,层层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对应着的是一级一级的官员队伍,让没有级别的大学校长去管理和领导厅级的院长、县处级系的主任,也忒不现实。

大学去行政化,首先要确保大学校长的非官员化,成为与职业经理人相似的职业校长,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教授治校”和“教育家办大学”的目标。而有了这个前提,才能继续倒逼整个高度行政化的高等教育体制逐步脱离权力之手,走向学术自由和独立。只要大学校长实现了职业化,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中小学校长官员化的现状就会得到改变。

再专业化的学者只要戴上了“级别的官帽”,都会受到体制的制约和束缚,官员的本色会远远超过教育家的激情。这几乎是必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去行政化还是要从根本的体制入手,不能将大学去行政化简单理解为大学校长去行政化,更不能把大学校长去行政化操作成大学校长去“任命化”。否则,关乎高校教育体制改革的种种“探索”都会沦为形式主义和空中楼阁,中国第一所“教授治校”模式的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的各种困境和被“招安”的现状,就足以证明一切。 陈一舟